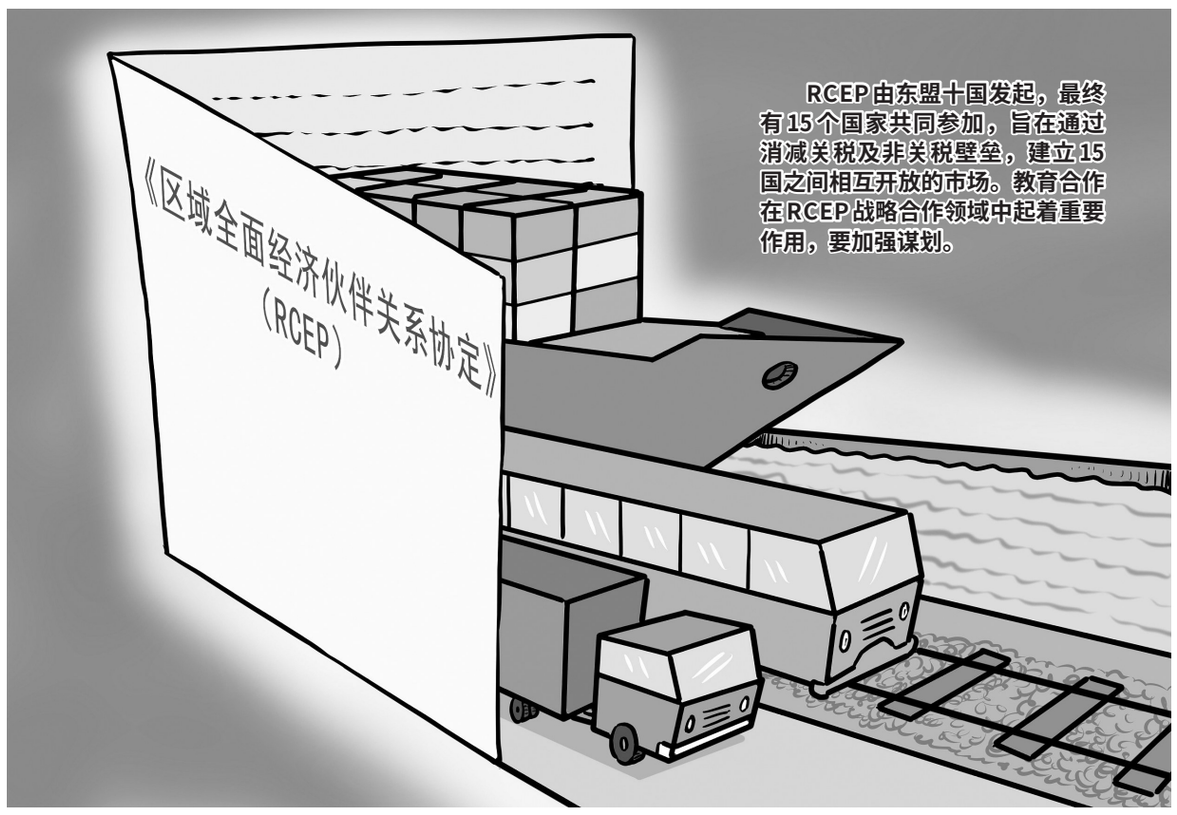
国际观察

谋划RCEP教育战略合作

周满生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它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的自由贸易区建成，将通过消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15国之间相互开放的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它是东盟之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又一重要经济里程碑，有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RCEP于2022年1月1日生效，率先生效的范围包括已经完成核准的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家。2月1日起RCEP对韩国正式生效。其余4个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也将在完成核准后纳入生效范围。

RCEP主要是经贸合作，但其价值不局限于经贸领域。人才和知识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和载体，RCEP不仅要重视经济主导作用，也要重视文教科技领域的作用。教育合作在RCEP的战略合作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教育领域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战略谋划。



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最终有15个国家共同参加，旨在通过消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5国之间相互开放的市场。教育合作在RCEP战略合作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要加强谋划。

RCEP生效，开放合作是国际主流。 视觉中国 供图

全民教育领域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十国在全民教育领域有长期的合作。1990年3月在泰国宗滴恩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世界银行主办，会议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强调了基础教育的全民性。会议从社会发展角度提出全民教育，即满足儿童、青年及成年人基本学习需要的思想，强调全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动员和组织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全民教育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两个文件对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有着重大的影响。《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全民教育总目标非常具有时代性、全局性、前瞻性，中国政府也如期实现了这个总目标。中国实施全民教育进程明显快于全球，中国为提高全球人类发展水平作出了贡献。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教育人口大国，学龄儿童数量庞大，是发展中大国办大教育的典型。中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成就，特别是为上亿学龄人口提供免费、公平而有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对国际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

东盟十国除新加坡外，全民教育的发展并不理想，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经验可供东盟国家借鉴。同时，全民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流动人口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国家间也可以相互学习借鉴。比如，迁徙管理政策影响着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不少国家由于担心出现不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失控，制定相关政策遏制迁徙。中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曾导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被挡在公办学校之外，但近年来，我国对这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随后，各地逐渐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的有关费用，切实简化优化了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然而，迁徙者接受教育依然存在障碍，证件和其他入学要求可能会限制入学机会，比如，办齐一些证明才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教师可能对迁徙青少年抱有歧视态度。越南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越南的户口政策限制迁徙者接受公办教育，从农村迁居城市的穷人往往迁往公办学校不足的地区。越南近年来的政策旨在取消种种限制，但过去政策遗留问题使得仅有临时身份的迁徙者依然处于不利境地。再如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问题，东盟国家也面临挑战。柬埔寨留守儿童的辍学率很高，特别是女童。一些研究报告发现，迁徙对学生成绩有积极的影响。其他研究显示，与同龄人相比，留守儿童的成绩偏低，心理健康问题较多。这些问题有待于RCEP国家开展区域研究并共同解决。

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

中国与RCEP国家中的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有长期的合作，还相互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2022年QS亚洲大学排名中，新加坡高校连续八年取得榜首成绩，其中近四年的第一名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而新加坡另一所著名高校南洋理工大学则排在榜单的第三位。马来亚大学、东京大学、高丽大学、京都大学、首尔大学等也名列榜单前列。该榜单涵盖了东亚国家的所有著名大学。QS的一些评价指标如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国际研究网络、论文被引用率等对我国高校提升质量、提高效能有借鉴意义。吸纳国际留学生数量在国际上也是评价一所大学国际化水平、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学校越好吸引的留学生越多，留学生质量越好就越能提高学校的知名度。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新加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分列第11位和12位，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列第23位和33位，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分列第27位和37位，这些著名大学无论在开展学术交流，还是在接受留学生方面，都与我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势力的叠加影响下，出国留学受阻。在RCEP区域内，推动高等教育深入合作与交流，无疑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是特别高，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生源和就业不佳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招工难”和“就业难”问题同时存在，技能劳动者比例偏低且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从2019年开始，国家密集发布了一系列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地位、办学主体、培养目的、财政支持、未来发展方向等进一步明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道路、能源、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在不断扩大。RCEP成员中的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起步较早，逐步解决了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社会脱钩的问题。如新加坡积极与跨国公司签订人才培养合同，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培养出一批实用型高技能人才。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学院（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以学校为本位的产教结合模式。中国的职业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开拓国际视野，采用课程国际化认证及国际通用的资格认证制度，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构建、师资和员工培养、实训条件建设和教学组织等方面与RCEP国家开展合作，构建办学新机制，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RCEP开放交流的新平台，制定紧密、实质的联合培养机制，使培养目标与用人标准相衔接，提高教学与实践的结合度。通过多方互动、联结与共享，真正达到产教融合，最终实现多方共赢与发展，形成中国独特的职业教育品牌。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极为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是培养一批掌握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与国际话语权的专业人才，这需要相应的人才培养与使用制度作支撑。对我国而言，亟须培养更多具备议程设置能力、规则制定能力、舆论宣传能力与统筹协调能力的人才，掌握全球话语，面向未来，以新的方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RCEP国家中的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乃至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大量的职业外交官、国际问题专家、国际组织兼职人员，这些人在各种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中工作，有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与RCEP国家密切合作，有助于完善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政策与管理，发现、培养并选拔更多人才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像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样，RCEP也制定了很多规则，这些规则与教育、科技领域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并遵守。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环球快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关注移民背景学生教育获得感与幸福感

2021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工作报告《移民背景学生的抗逆性：基于PISA2018数据的更新》（The Resilience of Students with an Immigrant Background：An Update with PISA 2018）。教育在促进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融入东道国社会方面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它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参与经济社会的技能，增进学生社会和情感福祉，并支持他们参与社区的社会和公民生活。然而，如何确保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取得良好成绩是一个难题，因为他们需要克服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劣势和语言障碍等不利因素。

报告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具有移民背景学生的学术、社会情感和动机的抗逆性，并研究了近年来不同学生群体是如何变化的。研究表明，在东道国有移民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通常与其原籍国相关，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各国的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化差异，除此之外，文化相似性以及东道国和原籍国教育体系的质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教育系统可以掌握关于移民学生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以更有效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促进他们在教育和其他方面的融合。

（陈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呼吁促进儿童数字化学习

2021年1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报告《为每个儿童提供数字化学习：为包容且繁荣的未来消减差距》（Digital Learning for Every Child：Closing the Gaps For an Inclusive and Prosperous Future）。该报告就如何公平地扩大数字学习，并为儿童和年轻人提供技能，以改善他们的前景和保障他们的福祉，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它提出了教育系统在合理前提下使用数字和混合学习的解决方案，并敦促20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克服限制数字学习的障碍。

报告指出，数字化学习面临一些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48%的儿童、低收入国家90%的儿童处于“学习贫困”状态，10岁前无法阅读和理解一篇简单的文本，转向更多的数字化学习可以改变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目前数字化学习的主要障碍依然存在。

为了扩大公平的数字化学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采取行动以消除电子和数字鸿沟，为所有儿童提供负担得起的优质在线教育资源，同时支持有效的数字化学习和混合式学习的实施，保护儿童的福祉和安全，为儿童、家长和照顾者提供心理援助并制定具体指导方针。

（李倩）

热点关注

疫情正在加剧儿童“盯屏”危机

本报实习生 李聿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图片墙（Instagram）在用户调查中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对儿童有害，这一结果让社会开始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儿童生活的影响。在国内，抖音（一个短视频社交软件）向用户推出了新的心理健康平台服务，一些专家认为这“值得鼓励但为时已晚”。

当前，儿童确实每天“盯屏”太久了。2019年，共识媒体组织研究发现，8—12岁的儿童每天平均花近5小时时间在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机和电视的电子屏幕上。对于13—17岁的儿童，这个数字则攀升到了7小时22分钟。

2020年—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交隔离让教育者和家长极度担忧，因为网课的开展让孩子们“盯屏”的时间变得更长了。美国南汉诺威小学四年级的教师香浓·格瓦雷兹说：“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今年学生们的变化，他们现在经常不自觉地就盯着各种各样的屏幕。”她认为长期来看，这对孩子们还处在发育阶段的大脑会有不良影响。

儿童刷屏上瘾

手机发出新消息提醒“叮”声时，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大脑中的多巴胺则释放“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给我们的身体，强化我们的行为，最终引发上瘾。但遗憾的是，儿童的大脑仍处在发育阶段，因此他们并不能像成年人那样，有足够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去控制刷屏上瘾带来的后果。北卡罗来纳州的数学教师萨姆·鲍担忧地说：“很多七年级的学生因为沉迷社交媒体熬夜到很晚，变得特别焦虑且睡眠不足。他们对‘叮’那声的上瘾程度已经非常深了。”

一些调查显示，尽管一些儿童能够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各种影响，更多的儿童则对长时间的刷屏表现出焦虑、压力和情绪低落。致力于研究数字媒体对儿童成长影响的机构“儿童与屏幕”的主任帕梅拉·赫斯蒂拉表示：“都是刷屏惹的祸，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社交媒体就像是电影里的高光时刻，社交攀比、压力和怕错过新消息的恐惧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关系。”专家认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儿童无法外出社交，他们的生活只能被网络社交媒体占据，因此更加沉迷刷屏。

在疫情发展6个月后，美国儿童脑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亚合作项目围绕着网络使用、睡眠、运动和情绪等内容，与45名高中生开展了深度访谈，调研结果形成了《孩子们还好吗》报告。报告提到，新冠肺炎疫情让网络生活几乎成了儿童生活的全部。儿童不断机械地刷新消息，他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刷屏”，无力也不愿停下来。报告还发现，儿童在出现了头痛、失眠、乏力等状况后，仍觉得这种刷屏上瘾无关紧要，也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

警惕对于新媒体的应用

另一项调查显示，儿童更倾向于将社交媒体评价为“对情感生活有益”。临床心理咨询师简宁·多米哥表示，疫情隔离期间，社交媒体是“一座必要的情感桥梁”，是儿童与外界的接口，帮助他们与朋友保持联络。富兰克林海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凯瑞·苏琪也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侵害了儿童的健康，但年轻人确实喜欢从这些网络渠道寻找资源和建议，且为此焦虑。

苏琪指出，现有的研究对刷屏和焦虑的因果关系仍不明晰，不过学校和教育者应承担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课堂上不允许使用手机，但如今新媒体俨然成了教学的一部分，学生上课时往往也需要“盯屏”。教育者应该时刻思考新媒体应用的必要性，只有在它展现出足够的互动性和教育性时才加以使用。否则，它就不再是有用的教具，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盯屏时间”，对学生身心健康有害。

教育者可以在防止社交媒体过分影响儿童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赫斯蒂拉表示，教育者应该鼓励学生勇于表达他们的焦虑，屏幕让学生失去了公开表达自我的能力，因此他们的忧虑更需要被身边的人倾听，更重要的是，应该让家长也意识到过分刷屏对学生的影响。简宁·多米哥也认为，和家长保持沟通是关键。因为疫情，学生在家里的时间更多，所以教师应该和家长保持沟通并加强合作，共同降低刷屏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教师要采取积极行动

为了应对刷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教师也在积极行动中。萨姆老师尽可能地将学生的兴趣从手机转移到课堂教学上。面对学生对社交媒体过于痴迷的状况，香浓·格瓦雷兹毫不犹豫地在她的课堂上实施“无屏幕”条例——自习时，她要求学生彻底远离屏幕。“他们真的需要远离屏幕做点儿别的事，好好放松。”香浓·格瓦雷兹说。

校园里充斥着的新平台和新设备给学生灌输了一种观念，即科技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都应该“统治”他们的生活。专家认为，教师必须有意识地探索新媒体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而不是为了追赶潮流就任意使用它们。如果在课堂上滥用新媒体设施，教师就不算称职的教育者。教师应该为学生做出榜样，如果教师滥用新媒体设施，学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电子屏幕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这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本文编译自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官网报道）

非洲教育发展协会：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与时俱进

近期，非洲教育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frica，ADEA）发布了《重新思考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未来工作和终身学习中的作用——基于数字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报告。

报告简要介绍了一些非洲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技能系统的数字化总体概况。主要数据来自对安哥拉、加蓬、利比里亚、科特迪瓦、毛里求斯、摩洛哥、卢旺达和乌干达等8个国家的文献综述，以及对科特迪瓦、毛里求斯、摩洛哥、卢旺达和乌干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部门的专家和从业人员发放的问卷调查结果。

报告表明，尽管非洲国家宣布了承诺并取得了一些相应进展，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并没有得到非洲国家的充分承认。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和设备质量普遍较差，为女性、弱势群体及残疾人提供的设施不足，缺乏优质的培训人员，缺乏有关培训人员和培训机构管理的国家方案，培训能力不足，课程陈旧，技能不匹配等。简言之，许多非洲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普遍在为上一代设计的模式下运行。此外，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东亚模式，在当前的颠覆性技术变革及其对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影响面前正迅速失去优势。

（杨雨欣）